



中国
国际
战略
丛书

BOOK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

大国 转型

大国角色变化的成败

窦国庆◎著

揭示大国转型成败得失

寻求中国战略转型之路

The Great Nations in Transiti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中国
国际
战略
丛书

BOOK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

大国 转型

大国角色变化的成败

窦国庆◎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转型：大国角色变化的成败 / 窦国庆著. —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7

(中国国际战略丛书)

ISBN 978-7-5162-0922-6

I. ①大… II. ①窦… III. ①国际政治 - 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4775 号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版统筹：赵卜慧

丛书策划：石松

责任编辑：刘妹宏

书名/大国转型：大国角色变化的成败

The Great Nations in Transiti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作者/窦国庆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010 - 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真/010 - 63055259

http: //www. ncpub. com

E-mail: mzfz@ncpub. 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6 开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张/17 字数/225 千字

版本/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162-0922-6

定价/39.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神圣的母校：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以及梦开始的地方——伟大的陆军第一集团军和英雄辈出的尖刀七连。

序

PREFACE

如果战略问题被当作科学，其价值就是使用别人研究的成果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战略问题被当作艺术，那么其价值在于用独创的成果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推动历史经验延续容易被拘束于一事、一局、一隅的一孔之见，也容易陷入为取悦大众而取悦大众的肤浅当中。强大者从来都是善于和敢于超越历史的。

所有大国的沉浮所蕴含的涵义只有一个：防止失败必先防止僵化，而防止僵化就要不断实施国家转型，即善于改变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趋同，而能够在趋同中成为引领者的都是那些积极主动实现转型的国家。因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永久保持一个角色，尤其是在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也许，当我们发现时代开始改变时，时代已经发生改变了。正如中国近代那些有识之士认为的那样，中华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其实世界本身就一直是变局，推动变局的是人不断更新的需要，也是变局本身赋予人角色不同的需要。

培养自己的活力，不是要排斥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是要认识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对手和朋友的身份差异，但却不能简单复制和频繁出现。习惯于墨守成规的战略思维使国家陷入

僵化的厄运并无限循环，而习惯于超越历史、打破常规的战略思维却使国家在变局中不断实现优势。

国家转型，首要一点在于战略思维，战略思维代替不了许多功能，它之所以处于转型的首要位置是因为战略思维如何运用决定着转型的路径效率和能力塑造。战略思维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活力能否得到激发。

现实世界上有两种战略思维：一种是国家需要转型时，再考虑如何转型来获得主动。另外一种转型成为国家在每个历史阶段中的常态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决定了国家不同的命运：前者使国家成为变局的适应者；而后者使国家成为变局的推动者。

虽然任何一个国家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历史，但就像世界上没有两条同样的河流，也没有两段相同的历史。所有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反思历史经验、敏感地预判未来，使自己走向下一次胜利。积极的转型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战略优势，它使自己针对时代的变化，作出比朋友和对手更新的反应，而不仅仅是更快的反应，永远置对手于无所适从、置朋友于景仰崇拜。

转型应当是个性的塑造。虽然要遵循基本的客观规律，但不能将规律当作教条而成为它的奴隶。要形成优势就必须有别人没有的能力，或者使别人不敢也不能使用优势的能力。开辟新的道路，是转型的基本原则。转型战略的塑造，必须首先学会挑战现有规则，对现有规则的禁锢理解得越深刻，对其挑战的力度会越大，就越难令对手和敌人模仿、超越和研究；令对手总是看到自己的过去，而看不到现实的、真正的自我。

聪明的战略思维运用规则，伟大的战略思维创造规则。国家转型是一项伟业，而转型的战略思维则是伟业中的伟业，不仅要运用规则，更要突出创造规则。脚踏实地只能满足于一个高度，而攀岩登山则会由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不仅需要脚踏实地，更需要攀岩登山。

龚国庆

2015年4月

前 言

FOREWORD

中国急需转型战略

对于大国而言，最难的不是自弱势为起点的“韬光养晦”的励精图治，而是在实力地位不断变化时的“预判、规避风险和创造、抓住机遇”。因为实力地位不断变化，需要在战略设计和战略举措中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力地位而不断调整，如果仍然立足于旧位势来设计新位势时的未来之路，那么无法实现自己不断改变的真正利益。国家真正的风险正在于此。历史上的大国，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教训要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经历大起大落的命运。角度转变的战略比起由弱到强转变的战略难度要大得多。这是目前中国最为忽视的战略问题。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战略牵引已经发生变化，处于国际格局中角色转变的微妙时期，无论其角色的战略定位，还是实施路径，甚至是遭遇具体和偶然问题之解决，都应当超越历史前人。

大国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多种多样，安全、发展、地位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制度和文化的存亡问题、领土主权的边界得失问题、经济能源的贸易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治世者要将它们条分缕细地一一处理，无疑就会像要陷入无法摆脱的泥潭当中的老虎，有劲使不出，还会越挣扎越危险。避免风险和抓住机遇是所有治世者的难题。

从历史经验出发，解决这个难题有两种模式：一是就事论事型。即当风

险与机遇来临时，只是应对事情，在应对事情中规避风险和抓住机遇。二是整体规划型。即在对利益诉求和格局发展的大势的判断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战略设计和制定战略举措，对于多种风险与机遇有着预置式的解决之道，把压力推向对方、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仅仅局限于前者模式，即使每件事情都应对自如，那么国家也会陷入机会主义者的思维，难以长久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随着每件事情的解决，所有国家都无法不面临这样的局面：每经历一件事情，自我变革的动力便增加一分。当事情的解决不断积累时，自我变革的动力便使自己处于自我变革的门槛之上。

如果仅仅去追求后者模式，那么治世者务必具有清醒、长远的眼光，准确把握别人难以洞察的大势和敏感抓住别人易于忽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大师反而因为高深而陷入孤立，难以培塑具有正确执行力的治世团队。

所以，我们不能说，前者使自己处于被动应对之状，就弃之于不顾；后者主动设计就完美无瑕。前者模式容易被接受和采纳，而后者模式的成功却不仅需要智慧、眼光和坚韧之毅力，而且还需要“上天垂青”般的运气，否则将很可能流于形式。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治家和秩序构建的大师、政党和某种政治制度能够做到后者的模式。因为客观来看，所有大国面临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大师能够将两种模式结合得更加完美。

这两种模式结合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转型，即不断根据自身实力地位的发展变化，敏感地着眼于不断变化的格局来谋求自身的最佳位势。大国中兴难，难的不是增强实力地位，难的是根据不断增强的实力地位而不断谋求最佳位势，以实现持续的中兴。近代的德国和日本在由旁观者和羡慕者的身份加入强国俱乐部后却遭遇惨败，战后致力于和平发展，重新进入国际舞台中心；苏联由一个欧洲边缘的大国俄罗斯诞生而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一极，可谓风光无限，然而，最后也不战自垮。这些大起大落的民族命运，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以旁观者的心态，以自我价值和位势来分析其经验教训，无疑是对历史经验财富的误用。我们应当学会站在它们当时、当事的立场上考虑为什么它们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应对，对未来的局势它们是怎样思考和推动举措的。因为我们现

在也处于一个实力地位快速变化的历史阶段，而且当前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快得多，如果我们再用以前的心态和立场来应对和设计未来的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无疑会使我们难以谋求到最佳位势，这样，历史教训不仅可能重演，而且之前付出巨大牺牲得来的成就可能也会功亏一篑。

中国今天面临的根本挑战不是由弱到强，而是实力地位不断变化而带来的身份重构，存在着历史经验和未来创意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美国在从孤立向国际化转变的时代，德国在俾斯麦时代，法国在黎塞留时代，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代，各个大国之所以能完成角色转变，无一不是在自身历史经验和未来探索中获取平衡的。

如何在角色转变中塑造自己是中华民族当今首要课题。角色转变期充满着各种风险，否则世界风云也就不会这样变幻了。法国、德国、俄罗斯这些国家虽然强盛，但纷纷在角色转变中迷失，从而酿成大错，并非它们自身不够成功，而是它们似乎不擅长角色转变。

法国在黎塞留时代转变角色成功，由一个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阴影下的二流国家变成欧洲秩序有力构建者，之后便很少有成功的角色转变，无论如何努力，总难以逃脱对欧洲和平和均势的破坏者角色。先是路易十四四处征伐，使法国成为欧洲众矢之的；再是拿破仑独力支撑法国大革命后的孤立危局，最终战败；经过休养生息，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有所起色，但不久又败于雄才伟略的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最终沦为二流国家。从此之后，法国只能跟随英国，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胜，但国力和自信已经在强大的德国面前耗损殆尽，致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便耻辱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时代又期望成为独立后的欧洲中心，但在美国成为西方盟主的情况下，它的影响力总是有限，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造成被动。

德国统一后，由欧洲强国中最弱势地位突然成为欧洲政治中心，心态似乎因突变而丧失应有之理性。在俾斯麦去职后，开始四面树敌。先是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同时对英、法、俄展现咄咄逼人之姿态，与英国展开海军竞赛、与俄罗斯交恶于东欧、激化法德世仇，最终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

希特勒野蛮扩张，同时与美、苏、英大国为敌，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陷于冷战之中的国家分裂。

俄罗斯亦是如此，从欧洲边缘崛起后，不断向四周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成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又由欧洲边缘大国，变成地跨欧亚大国，最终变成欧亚大陆之强大陆权中心、世界一极的身份，但苏联在战略上完全继承俄罗斯衣钵，无任何变更，最终于冷战中陷入中、美、日、欧的包围，在内外交困中陷入巨祸。

这三个海陆大国角色转变不成功是因为，作为陆海大国，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们比美、英、日等纯海上国家，更难超越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历史经验，而且，不同的国际位势，导致其地缘政治优劣转变，从而导致情势巨变，而自己却以以前之经验应对新鲜情势，如何会不遭遇曲折，甚至挫折？

世界各国，最成功的莫过于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角色的转变成功使它们能够把握自我，而不是像法、德、俄那样在角色转变中出现动荡和起伏。

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步入转型的门槛。面对当今它们的成败得失时，必须想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从世界范围看，每一个大国在其崛起进程中，无一例外地遭遇其他大国打压、邻国疑虑，确保安全和拓展利益的矛盾凸显，中国也是如此。因此，中国迫切地需要以开拓性的胆识和创造性的视野，以更大的战略突破和更高的战略着眼，实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转变的优势和主动。

窦国庆

2015 年 2 月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 001

俾斯麦时代：构建根基不牢的大陆体系 002

威廉二世时代：交错中的冲动与误解 021

· 第二章

以屈求伸的日本 摆脱命运怪圈的探索 037

吉田茂时代：战败后的重生 038

田中角荣时代：开拓者的起步 049

中曾根时代：跨越历史的门槛 058

小泉纯一郎时代：历史与民族命运的回归 067

· 第三章

大起大落的苏联 从巅峰到末日的起伏 075

赫鲁晓夫时代：以攻为守的代价 077

勃列日涅夫时代：顶峰时的脆弱地位 085

戈尔巴乔夫时代：自陷末日 094

· 第四章

江河日下的英国 不屈的地位重塑 107

危机时代：风光不再时的主动作为 113

缓和年代：实力依旧时的深沉 132

· 第五章

身处巅峰的美国 从被动走向霸权 137

尼克松时代：以退为进的缓和 139

里根时代：重振国威的灵活反攻 148

小布什时代：制造不可预见的动荡 160

· 第六章

成败难评的法国 守护历史与开辟时代 171

戴高乐时代：老英雄的民族梦 174

萨科奇时代：新时代的调和者 183

· 第七章

把历史当镜子 对中国的启示 193

如何向强者学习转型 195

如何形成战略思维优势 206

如何获得地缘政治优势 212

如何超越民族传统文化 223

如何处理安全与和平 238

· 注 释 245

第一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

历史上鲜有一经统一便令世界为之一震的国家。德国便是这样一个少数国家。雄才伟略的俾斯麦利用了普鲁士在欧洲列强中的传统弱势和欧洲均势体系的漏洞，使德国得以统一。然而，德国的统一并未超越普鲁士的天然地缘政治条件，纵使精明、冷酷的俾斯麦也难以避免德国陷入自己织下的网中，当威廉二世执掌德国时，在缺少理性的民族自豪感、缺乏磨练的个人性格的催化下，强国之路变为歧途。

德国一经统一，便使欧洲为之一震。以前强大的法国是欧洲大陆治乱与战和的晴雨表，而今变成了德国。比起法国，德国有更强的军力和经济、更多的人口。当所有大国都将焦点由法国转向德国时，反而使德国不如普鲁士那样能以灵活的立场与位势来经营自己的安全。以前的普鲁士是大国构建的秩序的边缘者，它只能是适应秩序的改变与转换，而难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德国却不是如此。德国再也不可能是秩序的适应者与追随者，而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参与者与塑造者。

使大国走向成功的力量总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历史惯性。德国的统一是建立在普鲁士强大的陆军、勤勉的国王，以及雄才伟略的俾斯麦在大国间成功地纵横捭阖的基础之上。所以，统一后的德国，其命运走向不能脱离对自身实力的自信、治国者对形势变化的判断，甚至是否之后出现具有同等程度的雄才伟略的人物。然而，如果连续两代都出现同等程度的雄才伟略之人，那么这个国家绝对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幸运儿。

俾斯麦时代：构建根基不牢的大陆体系

德国是在欧洲充满了对它的不安全感、冷眼质疑，甚至是敌对的情势下

统一的。普法战争已经使法德世仇难以消解；普法战争之前的普奥战争使德国失去了奥地利这个强大的盟友；英国和俄罗斯两个左右欧洲均势的侧翼大国开始将德国视作主要威胁。

德国的直接威胁是法国，遭到普法战争削弱的法国已经无力单独对抗德国，需要英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因此，德国应当主要关注英国和俄罗斯。英国仍然奉行“光荣孤立”，对于一夜之间强大起来的德国，不可能采取极端的压制举措，只会冷眼旁观。俄罗斯对于西部边界的敏感、扩张野心，以及在斯拉夫民族中保持强势地位的诉求，随着德国的统一也开始变得强烈。英国关心的是法、德、俄三者能否形成新的均势，或者三者是否会破坏原有均势。俄罗斯关心的是德国统一对俄罗斯西部安全与其在东欧地区的地位有何影响。显然，德国在没有强力盟友的情况下，如果咄咄逼人，则会受到英、法、俄三个欧洲大国的共同遏制而陷入危险的孤立。而如果德国对既定秩序“低头”，早晚会导导致法国重新强大，这使德国面临两难选择：要么等到法国强大后再孤注一掷地与其搏斗，要么在法国强大之前以向英国和俄罗斯让步的代价不断孤立法国。两种情况对德国都不可能是最优选择。

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便是在左右为难中构建在历史上被称为大陆体系的欧洲秩序的。大陆体系其实是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均势体系这座“纸棚屋”的“裱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均势秩序之所以能够维持和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欧洲大陆大国间均势获得英国的认同。二是欧洲大陆大国中，受到拿破仑战争伤害最大的俄罗斯、奥匈帝国、普鲁士三个欧洲大陆大国对法国“宽宏大量”，吸收法国进入大国协调体系。然而，这两个原因都难以持久，这主要是因为战胜拿破仑法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俄罗斯具有更加强烈的向东扩张的野心。普鲁士获得了长期的和平，集中精力进行军队改革、优化国民教育，国力在欧洲大陆和平中不知不觉地增长。奥匈帝国虽然是欧洲均势的主要推动者，但是经过连年战争消耗，治国者的主要精力被欧洲政治事务和民族矛盾牵扯，难以像普鲁士那样提升国力。所以，欧洲均势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基于既定实力地位，约束了未来的实力增长者，最终导致未来实力增长者不满足于现状而自行其是。欧洲大陆大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但其作用只是减缓了未来实力增长者打破既定秩序的步伐，并未消除

它或它们打破既定秩序的决心。所以当最具躁动性的俄罗斯在东南欧扩张有可能伤害到英、法等海上大国的势力范围时，欧洲均势体系便开始动摇。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足以说明欧洲均势体系的脆弱。英、法与俄罗斯开战，不仅是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共同秩序的颠覆，还使共同秩序成为所有欧洲大陆大国的束缚，以致所有大国均对其不满。法国利用欧洲均势体系制造了和平休养生息，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使法国开始了重振欧洲大陆中心地位的努力。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欧洲均势体系便是为防止法国东山再起而构建的。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暂时停止了在东欧咄咄逼人的举动而专心向亚洲扩张，这样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对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力弱化。奥匈帝国和普鲁士这两个利用欧洲均势体系避开英、法、俄三个大国的倾轧的较弱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既不能站在英、法一边，又不能站在俄罗斯一边，左右为难中，只能坐看欧洲秩序地动山摇。尤其是奥匈帝国的地位极为尴尬，秩序的擘划者面对秩序被动摇而无能为力。

如果法国赢得了普法战争，那么英法之间的历史极有可能延续争霸状态，那样，欧洲的历史也只是重复，不具备真正的颠覆性意义。但残酷的现实是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而且造成德国统一，欧洲大陆实力格局遭到颠覆。以前，欧洲大陆秩序的变数仅限于法国，而德国统一后，欧洲大陆秩序的变数取决于德国与俄罗斯。

德国正因为刚刚统一便成为欧洲大陆政治中心，所以，它不能决定或者构建新秩序，但能破坏既定欧洲均势体系。俾斯麦的伟大在于可以预见德国“破坏作用”后的风险。德国无法像英国那样“超脱”于欧洲大陆斗争的漩涡，也无法像俄罗斯那样可以在某个时期只需要专注一条边界，而在另外一边专心于扩张。德国既不能向既定的边界后退，也不能将边界外推。只能利用各种复杂交织的矛盾构建重叠的联盟体系。

从直接威胁来看，德国必须围绕孤立法国，防止法国与英国特别是与俄罗斯结盟。所以，德国构建的大陆体系的主轴就是安抚俄罗斯，其战略举措就是“三皇同盟”^[1]。因为英国不希望改变“光荣孤立”的传统，所以，在英德同盟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德国必须利用英俄矛盾使二者互相牵制。这其实是对欧洲均势体系“漏洞”的修补，而不是秩序颠覆后的重新构建。

当然，德国不可能使英、俄感到德国是“安分守己”者，而是俾斯麦的克制与理智使德国享有暂时需要的和平。英国照样可以利用欧洲均势体系自由地拓展全球殖民体系，而且，德国推动构建三皇同盟，帮助英国遏制俄罗斯向西、向南扩张。俄罗斯可以利用和平与其西部边界外矛盾的暂时缓解，既专心于向亚洲扩张，又可以持续保持对东欧、中欧的影响力。俾斯麦构建的大陆体系使英国和俄罗斯可以坐享其成，而不是解决欧洲均势体系产生矛盾的根源，功能只是暂时掩盖了矛盾。拖延矛盾的代价就是矛盾早晚会激化至无法调和的地步。俾斯麦的大陆体系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使法国失去行动的自由权。法国时时刻刻地成为英国与俄罗斯压制德国的重要筹码。所以，德国的中心地位是在迎合、安抚英、俄，而不能对它们产生主动性影响。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德国与法国竞相发展与英、俄的“友好”，当然是因为德国的强大而使其更加主动，但并没有改善德国的安全地位。

时刻想着报普法战争之仇的法国因此而获得两个显而易见的巨大机遇：一是使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和俄罗斯认为，德国有进一步压制法国，从而破坏欧洲均势体系的野心。二是德国与俄罗斯关系破裂的可能性时刻存在，特别是德国可能基于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与利益，在东欧、中欧事务中偏向于奥匈帝国时，俄罗斯必将自行其是。从欧洲地缘政治的现实出发，有利于法国复仇的两个机遇都可能出现，而且当一个机遇出现，则意味着另外一个便自动生成。德国成为欧洲的政治中心，反而使德国受到限制。

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不利于德国。德国国内因为普法战争胜利，在被法国民族压制几百年后，民族主义情绪骤然爆发。在这种情绪的喧嚣中，治国者是利用权威来平息非理性意见，还是迎合国内民族主义使德国的战略更加外向，成为决定德国民族命运的关键。俾斯麦的权威可以保证平息非理性民族主义，但不能保证后来也有同等程度的权威来平息事端。作为一代治国和治世大师的俾斯麦，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作为宰相，也不可能解决好这一问题。

有人认为：“在俾斯麦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这样的观点显然只看到了俾斯麦纵横捭阖的风光表面，却没有看到德国在心态上的孤立和地缘政治处境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德国